

前摇摇头言

——我的教育研究生涯

1964年8月，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本科，并留校工作。当时，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将会成为一个教育理论、教育管理理论研究工作者。

今天，当我从200多万字著述中选出约30万字汇编成这部“精选”时，我又没有想到，在我的教育研究生涯中，竟贯穿着一条反映我研究取向和价值追求的主线——对我国基础教育的始终关注。于是，我把这本文集取名为《走进基础教育的真实世界》。认真回顾这一“走进”的历程，描绘我教育研究的思想轨迹，将不无益处，它不仅对我个人尚存的学术晚年的研究工作取向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对我国教育理论界长期存在的脱离教育实践的“苍白”状况，或许会是一种微薄的弥补。

让我把思绪拉回到30年前那个“动乱”的年月。我生命的黄金年龄段（25岁至35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物理学业务荒疏了，心灵被撞击了，然而顽强生活下去的意志却没有泯灭。当我所居单身宿舍的同事们白天劳动、夜里通宵打桥牌的时候，我拜德语老前辈张天麟先生为师，刻苦学习德文，没成想这门语言竟成了我以后学术转机的决定性因素。1980年，



我的另一位恩师——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主任的张禾瑞先生给我搭建了为硕士研究生开设科技德语课的平台，我编著了全国第一部《科技德语简明教程》，一教就是四年。198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教育研究的殿堂向我打开了大门。

1. 以跨学科研究为起点，以元科学研究为升华

1982年9月，教育控制论学科的国际创始人，前联邦德国的弗兰克（Helmar. G. Frank）教授在北师大教育系讲学，会后把他的一部新作赠送与我。两个月后，时任北师大教育系主任的陈孝彬教授为我提供了第一个教育讲台，让我为教育系师生介绍弗兰克先生的教育控制论。由于教育控制论这门新学科的吸引力和我的知识结构的优势，我立刻捕捉住了这个学术研究的机遇。在有关出版社的支持下，我翻译出版了弗兰克先生的这部著作，译名为《未来教育科学入门》。1985年，我在《未来与发展》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学术小文章《控制论教育学简介》。1985年，弗兰克先生邀请我到德国帕德博恩大学他的研究所做短期访问，这一去就将近四年。期间，我取得了弗兰克先生创办的国际科学院的人文控制论博士学位，并于1987年10月至1988年9月受聘为德国弗伦斯堡（Flensburg）师范大学客座教授。1988年回国后我被安排在北师大教育管理学院。我回国后的第一件事情是拜师，拜我至今仍十分敬重的北师大黄济教授、王策三教授、孙喜亭教授和陈孝彬教授为师。同时，我以极大的热忱介绍了教育理论的跨学科研究走向，形成了我的第一批学术成果，代表作是专著《教育科学与系统科学》，论文《论教育科学和系统科学的交叉与结合》。1990年，我同广州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包国庆教授共同发起、举办了“全国首届教育·科技与人跨学科学术研讨会”，我在会议开幕式上做了“教育·科技与人——一个有重要意义的跨学科课题”的主题报告。鉴于我在现代教育科



学研究领域的上述工作，1992年2月，总部设在意大利的“系统与控制论世界组织”任命我为“世界教育系统学会（WESS）”副主席。

1989年起，我开始承担教育管理学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并指导硕士研究生。应该说，这是我教育研究的一个切入点。从跨学科研究的视角来审视教育管理学的学科建设，我迅速地把兴奋点集中在下述三个方面：其一是教育管理学的学科性质、学科归属和学科基础；其二是管理思想和教育管理思想的演进；其三是教育管理的研究方法。于是，在教育管理学硕士研究生课程中，首次出现了“教育管理学概论”、“西方管理思想史”、“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育管理学的系统科学基础”等课程，我亲自讲授。经过五年的摸索，1995年生成了我的另一部代表作《现代教育管理学引论》，这部著作无论从层次，还是从结构，在教育管理学领域都别具一格，直到今天很多院校还把该书选为研究生教材。这项历时数年的教学、科研工作，获得了1995年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此间，我还发表了数篇关于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论文。

对教育管理学这一教育分支科学的跨学科研究，逻辑地导致对教育理论元科学的思考。1990年，我的硕士研究生（也是之后的博士研究生）开门弟子、年仅21岁的贺宏志在“教育·科技与人跨学科研讨会”上，宣读了他很有见地的关于对教育科学研究的反思的论文，提出了“教育科学的科学”这一概念，当时曾被一些资深教育理论家贬为“华而不实，言之无物，空话连篇”。然而，同年颁布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八五规划课题指南”中，列出了“关于教育学科体系的建设与发展研究”这一重点课题，该课题的研究内容竟与贺宏志论文中的观点惊人地相似。于是，我这个在教育理论界名不见经传、被列



入“另册”的学术工作者斗胆申报了这个课题。评审结果是，华东师范大学叶澜教授和我共同主持这项升格为中宣部 25 项重点课题之一的国家级重点课题。历时五年，在贺宏志和陈锋的加盟下，1996 年作为这项研究课题的代表性成果，我们出版了《教育科学学引论》，成为教育理论元科学研究中一部有影响的专著。在此过程中，从根本上改变“教育学”的体系，构建以指导我国大教育系统为宗旨的教育科学体系、结构成为我的又一学术特色，《教育研究》于 1992 年第 8 期发表了我的代表性论文《“教育学”学科称谓问题》。

2. 目光投向教育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随着学科研究的深入，我逐渐感到，在我国的教育科学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1991 年，《教育研究》杂志发起了两者关系的大讨论，作为结束讨论的总结性文章，《教育研究》于 1991 年第 11 期发表了我的《教育科学研究中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思考》，文中第一次提出了，根据我国国情，在理论与实践两者之间，有一个重要的中间层次——教育政策。如果教育政策上能遵循理论，下能符合国情实际，就能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为此，教育研究必须在理论、政策、实践三个层面及其相互联系中展开。大约从 1992 年起，我便把研究目光投向了一线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政策，而且集中在基础教育领域。

一方面，我多方位、多角度地密切关注我国基础教育的教育决策和教育政策导向，发表了《教育国情分析的几个问题》、《教育科学研究中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再认识》、《一个值得缜密思考的问题》、《我国高等师范院校办学方向刍议》、《跨世纪的教育呼唤教育法》、《论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教育改革的关系》等一批面向教育实践来审视教育决策和教育政策的论文。到 20 世纪



90年代中期，我进一步发现，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在社会转型期，我们的教育研究出现了“浮躁、浮夸、肤浅”和形而上学的不良学术风气，随意追求“新异”、追求“急功近利”、追求“唬人度”的倾向使教育研究背离了基础教育朴实而深刻的发展特点，于是我发表了《热点问题的冷思考——关于市场经济与基础教育的关系》、《教育思想何其多！》等论文，试图抨击这种不良学风。

另一方面，我在教育管理的教学和研究中，投入更多的精力关注基础教育实践。我借助全国中小学校长培训的机会，同北京、山东、山西、辽宁等地各种层次的校长以及基层教育行政干部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虚心向他们学习，考察基础教育一线实况。在北京，我把邱济隆、王本中、吴昌顺、李金初等15位首期“名校长高研班”的校长都视为我的老师；在沈阳，可以称得上“朋友”的中小学校长不下百人。他们的实践、经验和成就是我从教育研究的宝贵的资源。1992~1994年，我主持了北师大教育管理学院的和山西省阳泉市郊区合作进行的基层教育管理科研课题，我本人，并要求我的年轻同事和所有的硕士研究生每年“下”农村几周。只是在这里，我们才真正了解和理解了中国80%农村基层的教育管理和学校管理是什么样子，才懂得了我们在教室里津津乐道地学习的教育管理理论，在什么意义上、在多大程度上能应用于基层教育管理的实践。我和我的学生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在乡镇教育办公室里搭床就寝、在条件简陋的农村学校工作的日日夜夜，那才是我们师生教育研究生涯中最灿烂的一页。这项研究工作历时三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大大促进和推动了阳泉郊区教育管理的规范，形成了一整套区、乡教育管理的文件和地方法规。该项科研成果获教育部师范司“基础教育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鉴于我

对中小学教育管理实践的深入了解，1996年，我为教育部人事司培训处主编了“全国中小学校长提高培训教材”——《学校管理专题研究》。

1995年，我获得了国务院政府颁发的特殊贡献津贴。1996年我同北师大陈孝彬教授、曲恒昌教授等一起，申报、创建了全国第一个教育管理学（后更名为“教育经济与管理”）博士学位授权点，年轻学者贺宏志、孟繁华成为我的博士研究生的开门弟子。1997年我受聘为德国帕德博恩大学教育系客座教授，这一去竟又是四年，我在国内的教育研究工作也因而中断了四年。

3. 沉到中国基础教育的第一线，度过充实而富有意义的学术晚年

2001年，我年届花甲。由于对我国基础教育情有独钟，回国后我没有再回北师大，而是直奔珠江三角洲的中山市，志在有生之年研究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基础教育实践，那里有我硕士研究生课程班的72名优秀学员。以2003年5月为界，之前，我在中山市小榄镇受聘为镇政府高级教育顾问；之后，受中山市教育局之聘，任中山市教育局教育学会高级学术顾问。顾问，顾问，本来可以“有问则顾，无问不顾”，而我却要求自己把“虚”职做“实”，把自己定位在镇（区）和学校这个层次，在中小学教学和课程改革、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和中小学教育科学研究三个领域开展工作。同时，透过一线鲜活的教育实况，审视和思考我国基础教育的决策和政策。

历史的车轮前进到21世纪，教育需要发生什么样的变革，教育观念应如何更新，这是教育工作者必须明确回答的问题。为此，我于2002年发表了论文《21世纪的教育呼唤新的观念体系》。围绕着中小学教学和课程改革，我致力于把以新名词、



新概念为标志的新理念转化为一线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研究，主张还中小学教育朴实的本来面目，避免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浅显问题深奥化，形成了对新课程理念下的课堂教学的系统思考，力图回答在课改形势下什么样的课是一节好课，如何上好一节课。为此，我曾于2004年4月在中山市实验小学为小学一年级亲自执教两节（80分钟）语文课。围绕着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我提倡加强师德、师能、师风相统一的教师综合素质的培养，倡导教师通过长期自身修养和自我完善，追求教师的三种境界，即职业境界成为经师，专业境界成为能师，事业境界成为人师，实现教师的专业化成长。围绕中小学教育科学研究，我始终倡导“求真求实，精雕细刻”八字方针，提倡“贴近教师、贴近学生、贴近教学”和“小主题，大背景”的选题原则，大力扶持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宗旨的课题研究。透过微观领域的系统考察，升华到对宏观教育决策和政策的审视。于是，我的几篇近期代表性论文得以在2004年问世，这就是：《论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观》、《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辩证法》、《关于中小学教师自身修养和自我完善的思考》、《关于中小学教育科学研究的理性思考》。短短的四年间，我的足迹踏遍了中山市24个镇区中小学的几乎每一个角落，去过200多所学校，听了600多节课，为中小学教师做了400多场讲座。在与一线中小学校长、教师的朝夕相处中，我理解了一个理论工作者的价值取向和教育理想的追求，它是那样的深刻，却又是那样的实在。

这就是我对自已教育研究生涯的一个简要描述，集中为一句话：丰富的教育实践是教育理论研究永不枯竭的源泉。到教育实践中去生成理论、检验理论、发展理论、创新理论，这是

教育科研工作者的理智选择。这是一条充满挑战、艰苦的研究之路，但同时也是教育工作者实现教育理想、超越自我的幸福之路。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基础教育改革任重而道远。今后，无论在珠三角，还是回到内地继续我的基础教育研究，我都会初衷不改。

安文铸

2005年4月于广东中山

CONTENTS

目 录

前 言

——我的教育研究生涯 / 1

论文精选和专著摘编

教育战略和教育决策 / 1

 摇论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观 / 3

 摇21 世纪的教育呼唤新的观念体系 / 19

 摇教育科学研究中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思考 / 29

 摇论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教育改革的关系 / 39

 摇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辩证法

 ——学习“科学发展观”引发的思考 / 53

 摇

教育管理和队伍建设 / 67

 摇教育管理学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 69

 摇系统科学的共同原理与教育管理的方法论原则 / 109



- 摇关于教育管理学的学科建设 / 118
- 摇教育管理者面临着什么样的新时期? / 122
- 摇关于教育管理模式的再认识 / 129
- 摇跨世纪的教育呼唤教育法 / 136
- 摇教育管理方法技术辨析 / 139
- 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
——管理干部教育中的案例教学 / 144
- 摇知名学校与知名校长 / 156
- 摇教师神圣 / 162
- 摇关于中小学教师自身修养和自我完善的思考 / 166
- 摇
- 教育国情和体制改革 / 175**
- 摇教育国情分析的几个问题
- 摇摇——在比较中思考 / 177
- 摇一个值得缜密思考的问题
- 摇摇——教育体制改革同市场经济的关系 / 182
- 摇热点问题的冷思考
- 摇摇——关于市场经济与基础教育的关系 / 191
- 摇义务教育办学主体是谁? / 198
- 摇我国高等师范院校办学方向刍议 / 203
- 摇从传统走向未来
- 摇摇——德国高等教育见闻与思考 / 214



教育科研和思想方法 / 225

摇求真，求实

摇摇——21 世纪基础教育科学研究的取向 / 227

摇求真，求实

摇摇——关于中小学教育科学研究的理性思考 / 234

摇教育科学研究中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再认识 / 239

摇关于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再认识 / 249

摇教育思想何其多！

摇摇——兼评教育科学研究中的学风倾向 / 258

摇

教育理论的跨学科研究 / 265

摇教育·科技与人

摇摇——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跨学科课题 / 267

摇现代科学研究的特点和趋势 / 276

摇教育发展和科技发展 / 281

摇“教育学”学科称谓问题

摇摇——现代教育科学体系刍议 / 285

摇增强参与意识摇更新教育科学理论 / 293

摇教育科学与系统科学结合的可能性和途径 / 298

摇论教育科学和系统科学的交叉与结合 / 308

摇“现代教育的数学基础”教学初探 / 319

摇控制论教育学简介 / 329

附摇录 / 335

摇报道集锦 / 337

摇序言荟萃 / 363

摇著、译作总目录 / 379

摇主要论文总目录 / 381

后摇记

——无悔的选择 / 384

教育国情和体制改革



教育国情分析的几个问题

——在比较中思考

近来，改革中的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个热门话题，即国情分析。国情分析中的一个可喜现象是，通过科学的论证，把我们各个领域改革的背景和面临的严峻现实告知国民。分析的基本方法之一是比较法，本文拟就教育领域中的几个问题与发达国家做一比较，以引出思考及议论。

一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教育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已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问题。80年代初，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家都举行了“教育与当代科学技术”的大型讨论，并通过对未来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科学预测，得出了下述结论：在新的技术革命的时代，劳动技能主要不是靠体力，而是以智力和知识为基础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将迅速发展，脑力劳动在社会生产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知识的总信息量将大幅度增长，知识和技术的更新速度将日益加快。未来社会要求教育发挥其多种功能，培养出大批高层



次的新型专门人才。因此，一些发达国家都把教育改革同人的智力开发结合起来。例如，日本、苏联、瑞典等国具体地研究了“什么知识对未来是最有用的”和“怎样才算有知识的人”的问题，提出培养“全面的人”、“综合的人”和“通才基础上的专才”的目标。他们的教育改革不搞形式主义的口号，不贸然对教育体制动大手术，而是突出人的培养，从教育必须承担起开发人的智力和创造力的功能出发，扎扎实实地采取对策。在基础教育方面，着重课程结构、教学内容的彻底更新，剔除耗时而无用的陈旧内容，使学生在中学时代就接触现代科学技术前沿的预备知识。在高等教育方面，着重专业设置和课程结构的改革，强调专业综合化的趋势。在苏联、日本和联邦德国，这个专业和课程综合化的特点更为显著，纯自然科学或纯人文科学的系、专业已不再作为衡量一所大学水平的标志，取而代之的是以各种层次或形式同现代科学技术前沿相结合、相交叉的专业领域。由此可以看出，只有对改革的背景进行科学的分析，才能明确有的放矢的改革目标。

我认为，我国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对上述这一带有普遍性的背景分析缺乏足够的认识。首先，教育必须与经济同步发展，甚至超前于经济而发展的观念始终没有确立起来，“先经济后教育”的偏见仍顽固地束缚着不少领导的思想。其次，我们很少从飞速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角度来预测未来的经济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和对人的平均素质的要求。在基础教育中，我们提出了普及义务教育的目标。但同时，我们却始终使用着陈旧冗繁的统编教材。在高等教育中，不合理地调整专业设置和学科结构，不适当地相互攀比，专科改学院、学院改大学。

笔者认为，40年来我们吃的形式主义、盲目性的亏够大的了，是到了结合我国国情，准确分析我国教育背景和明确改革目标、步骤的时候了。



二

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着国内地区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反映在地形、气候、资源等自然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及人口素质上，同时也反映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上。有关的发达国家在进行教育改革、发展教育事业中十分注意地区的特点，强调与区域经济相适应的区域教育。以联邦德国为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初进行的是以统一学制为中心的教育改革，地区差异尚不明显。经济的恢复和飞速发展，使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出现了很大的差异，为了充分发挥地方优势，促进区域教育的发展，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联邦德国政府就采取了相应的改革措施。在学制上，政府只规定教育的几个阶段，至于幼教、基教、职教、高教的规模和比例完全由各州视经济发展情况而定，不规定统一教材，不实行统一的升学考试。高等学校不规定统一的专业和课程设置，完全靠区域经济之间的平衡自然调节专业人才的需求和培养。在教育经费上，它们实行以州一级政府提供教育经费为主的方针。联邦政府在教育总经费中只提供 10% 左右，州政府承担 70% 左右，地方政府承担 20% 左右。各州教育事业发展依赖于各州的经济发展水平。例如，在 70 年代中期以前，以煤炭、钢铁、化工为主的鲁尔矿区是联邦德国的主要工业基地，经济发展水平很高，因此，当地的教育事业也十分发达。

对比上述情况，我国的教育事业名义上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相结合，实际上基本是中央集权。在教育水平上，严重忽视地区之间的差异，较少考虑区域经济的不同需要。一个“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决定了基础教育中统一的教学计划、统一的

教材、统一的进度，致使沿海发达地区的教育不能充分发展，而内地后进地区始终赶不上的畸形发展局面。在人才培养规划上严重脱离区域经济的需要，各地区各种学校和专业设置交叉、重复，追求大而全，致使工业区和农牧区出现了反向的人才过剩或人才短缺的现象，造成人才的巨大浪费。在教育经费上，基本上依靠国家财政拨款，各省、各地区对教育经费不承担多大责任。如果我们能强调与区域经济配套的区域教育，给地方更多的领导教育的自主权，各地区办教育的积极性就会大大增加，就会形成一个与区域经济发展休戚相关的区域教育体制，以及全民办教育的局面，各种企业、实业就会成为区域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成为发展区域教育的坚强后盾。

因此，开展区域经济与区域教育的调查研究，制定区域教育规划是我国教育的一个环节。

三

在影响一个国家教育事业水平的诸因素中，教育经费、教育结构等都只是必要条件，而最根本的保证是要有一支素质高的、具有崇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稳定的教师队伍。这已是被无数国家的教育历史和教育实践所证实了的。联邦德国是欧洲教育史上最重视师资培养的国家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们的历次教育改革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革新师范教育。为了提高教师的素质和知识水平，70年代初联邦政府决定解散大部分师范院校，规定所有的中小学教师必须经过（相当于我国硕士学位程度的）高等教育，然后再经过两年的师范业务培训和实习，并通过两次严格的国家考试才能取得在中小学开课的教师资格。所有的中小学教师都是由州教育厅任命的、经试用合格的终身职业。中小学